

# 以“小”搏“大”

——英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文莱方式”

孔金磊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英属殖民地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看似掌握主动权,但在宪政制度设立、国家独立形态等方面依然受到英国的限制。然而,以文莱为典型代表的一部分小型殖民地,却能够在实力对比处于劣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争取自身利益,展现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性。1963年前后,文莱苏丹奥马尔以石油资源为条件,化体量狭小的“劣势”为“优势”,在与英国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博弈中掌握主动权,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达成了保障政治生存与经济利益的最终目的。这一路径创造了英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的“文莱方式”。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英属殖民地 非殖民化 小国  
“文莱方式” 石油资源

---

\* 孔金磊: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地区研究教研室讲师、中国马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邮编:100089)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地处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是东南亚地区的典型小国。<sup>①</sup> 16世纪起,文莱先后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入侵。由于其体量狭小,文莱并未受到英国等殖民政府的重视,长期处于殖民体系的边缘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在世界范围中兴起,并逐渐影响至东南亚地区,英国政府放弃了之前继续开展殖民统治的意愿,转而施行以“合作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非殖民化政策,逐步退出原殖民地。在这一进程中,自身实力羸弱的文莱本应全程被动接受英国政府的安排,实行民主体制并加入马来西亚联邦。<sup>②</sup> 但是,文莱却多次在宪政制度改革、国家独立形态等重要议题上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达成了有利于自己的既定目标,并未全盘接受英国殖民政府的安排,创造了特殊的“文莱方式”。

依照常规逻辑,文莱的行为与当时外界对其的“弱国”的认知实际并不相符。为何文莱可以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突破自身体量带来的限制,在与英国的博弈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是何原因导致文莱的非殖民化路径如此特殊? 本文基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文莱时期的电报、信件等一手文献,聚焦文莱的非殖民化进程,以1963年文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为核心研究问题,试图呈现文莱与马来亚联合邦、英国等方面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谈判的全景,探究“文莱方式”产生的具体过程与根本原因。

## 一、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与“文莱方式”的独特性

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殖民政府重回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试图继续接管原英属殖民地。不过,受制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等因素,英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原继续殖民的计划,转而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地区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这些殖民地总体上依然呈现了战后英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的基本特

<sup>①</sup> 本文采用韦民教授在其著作《小国与国际关系》中的小国概念,即“人口规模低于1000万的主权国家”可被界定为小国,参见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截至2019年,文莱人口数量达43.3296万人,符合该概念界定,故将其定义为小国,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brunei-darussalam>, 2021-05-15。

<sup>②</sup> 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指将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等英属殖民地合并为统一联邦的设想。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北婆罗洲(今沙巴)、沙捞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

点。不过,以文莱为典型代表的一部分小型殖民地,其殖民化路径除了体现出共有的基本特点,还展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成为英属殖民国家中的例外。

### (一) 英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的普遍性特点

16世纪至20世纪初,凭借强大的海上实力和工业经济基础,英国相继在非洲、美洲、亚洲等地区打败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霸主国家,占领了包括肯尼亚、圭那亚、印度等在内的殖民地,奠定了世界殖民霸主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政府重新回归原殖民地,试图恢复原殖民统治秩序。然而,在非洲、西亚等殖民地民族主义力量和国际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推动下,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呼声日益高涨,民族主义运动掀起高潮。与此同时,面对自身实力相对衰退导致无法兼顾殖民地管理的现实,英国政府对海外殖民地的镇压能力受到直接影响,<sup>①</sup>不得不改变殖民政策,采取战略性撤退策略,并承认殖民地的独立地位。<sup>②</sup>其中,1946—1970年是英属殖民地独立的集中时期,这一历史进程被学界统称为“非殖民化”。<sup>③</sup>

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内外学界开始对英国非殖民化进程进行研究,并随着历史资料的丰富和档案材料的挖掘一直延续至今。目前,学界对英国非殖民化进程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原因的分析,并提出四类主要的理论解释,分别包括“帝国自身实力下降论”“殖民地民族主义论”“新殖民主义论”和“主动

---

① 贾健:《英国“非殖民化”进程是战后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5页。

②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70页。

③ “非殖民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在1927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之后由印度共运创始人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首次进行相关理论的概括。1932年,“非殖民化”一词开始出现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首次在学界被使用,之后被用来指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帝国殖民地撤出殖民地,以及殖民地取得独立的历史阶段。虽然对“非殖民化”的含义学界曾有过争论,部分学者认为该词有美化帝国主义国家之嫌,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宣言”以及大部分学者的看法,“非殖民化”可作为中性词使用。转引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委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9—186页;Gene D. Overstreet & Marshall Windmiller, *Communism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127522/2015.127522.Gened-Overstreet-Marshall-Windmiller-Communism-In-India\\_djvu.txt](https://archive.org/stream/in.ernet.dli.2015.127522/2015.127522.Gened-Overstreet-Marshall-Windmiller-Communism-In-India_djvu.txt), 2019-06-14。

撤离论”。<sup>①</sup> 其中,部分学者倾向于将英国的非殖民化解释为英国殖民政府的主动战略选择,认为这是英国主动的、有计划的、逐步实施的行为,是殖民政府民主观念的体现,并不是对当地民族主义压力做出的反应。<sup>②</sup> 这些观点显然过分强调了殖民母国的意愿,忽视了殖民地的能动性。随着非殖民化时期英国政府档案的解密,英国方面主动选择推进非殖民化进程的这一观点已然令人无法信服。<sup>③</sup>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各殖民地同样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sup>④</sup>

英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过程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第一,英国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灵活度较高,充满现实主义色彩和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多采取镇压和分化等手段应对各殖民地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要求,出兵干预肯尼亚、缅甸等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压制了当地左翼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英国政府曾多次在殖民地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合法”地维护殖民地的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合理”地中止殖民地的反抗运动。不过,随着1956年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失败,英国逐步改变了殖民地政策,从强硬的压制措施开始对殖民地让步。英国政府意识到,殖民地民族独立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止,重建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失败。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曾表示,英国政府如果执意对抗该地区改革的步伐,英国将失去亚洲领导人目前的支持,因此英国要在改革这件事上与该地区保持一致。<sup>⑤</sup>

<sup>①</sup> David Strang, "Adding Social Structure to Diffusion Models: An Event History Framework,"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19, No.3, 1991, pp. 324-353; Lewis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An Appraisal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7, pp. 360-382;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第169—186页。

<sup>②</sup>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Lewis H. Gann and Peter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An Appraisal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7, pp. 360-382; Timothy 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8.

<sup>③</sup> 李安山认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想维持对殖民化的统治,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却不得不推进非殖民化进程。此前,英国并没有制定过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这一系列计划是不协调、不连贯,是消极、被动的,参见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第169—186页。

<sup>④</sup> 贾健:《英国“非殖民化”进程是战后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49页;王成:《从对抗到合作:马来亚非殖民化研究》,《学海》2003年第2期,第86—91页。

<sup>⑤</sup> Anthony J. Stockwell,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Malaya, Part One: The Malayan Union Experiment 1942-1948," *Series B*, Vol.3, 1985, p. 77.

同时,由于冷战的影响,英国政府意识到,“如果不顾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利益和要求,推行过于僵硬的殖民政策,英帝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很可能被共产主义大国拉拢利用,成为共产主义反对西方阵营的特洛伊木马”。<sup>①</sup>于是,英国政府转而采取务实且灵活的合作主义政策,逐步赋予殖民地自治权,最终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赋予尼日利亚、缅甸等殖民地的独立地位。<sup>②</sup>英国政府的这一行为看似主动,但实质是在自身实力下降、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相对被动的情况下采取的灵活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英国在当地的利益。

第二,殖民地表面上主动掌握独立进程,背后却依然受到英国的牵制。尽管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以“合作主义”为主要的特征,表面上看似满足了殖民地的需求,但这些政策实质上依然将殖民地置于被动状态,非殖民化进程多在英国的“指导”下进行。

对于殖民地谋求民族独立的要求,英国采取三项措施“以退为进”,最大程度维护了自身利益。

首先,与当地温和派精英分子合作,分化左翼民族主义力量。通过搞“假独立”和扶植本地代理人等方式,英国在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和文莱等地分化了反殖民主义力量,抑制了当地的激进要求。比如,在马来亚联合邦<sup>③</sup>,英国一方面满足当地组建政党、进行议会选举的要求,另一方面多次出兵镇压了马来亚共产党等左翼力量,与巫统等温和派展开合作,增加了撤出时的谈判筹码。最终,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确定英国可继续在当地驻兵、保证英国投资进入等条款,保障了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确保英国势力的继续存在。<sup>④</sup>

其次,对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需求,英国基本维持了海岛型殖民地的原殖民地行政基础,而对相近的小型非海岛型殖民地多采取合并策略,以“合而治之”的方法减少自身的负担。<sup>⑤</sup>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从地理类型上可分为海岛型和非海岛型殖民地。其中,海岛型殖民地数量较多,整体体量偏小,

① 王成:《从对抗到合作:马来亚非殖民化研究》,第88页。

② 以缅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殖民政府曾允诺缅甸民族主义者,将在适当的时候赋予缅甸自治地位。但是,战后,英国政府却一再延缓兑现这一承诺,加剧了与缅甸反法西斯同盟的冲突。面对缅甸社会日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和高涨的独立呼声,英国政府转而调整了政策,通过与缅甸谈判和签订《英缅条约》,逐步撤出缅甸,缅甸得以在1948年1月4日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

③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于1948年2月,是英国殖民政府在今马来西亚半岛设立的联合邦。

④ 王成:《从对抗到合作:马来亚非殖民化研究》,第90页。

⑤ D. S. Ranjit Singh, “British Proposals for A Domin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3-1957,”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71, No.1, 1998, pp. 27-28.

分布较为分散,而非海岛型殖民地则整体体量偏大且分布较为集中。对于海岛型小型殖民地,英国并没有对其独立形态有所干涉,所有的殖民地基本选择在原有殖民地的地理基础上取得独立,并以此建立主权国家。许多体量极小的国家,如瑙鲁和斐济等,在独立时也未选择与毗邻的沿海国家合并,借以增强自身的生存机会。不过,对于非海岛型小型殖民地,英国则多采取鼓励合并的方法,人为整合殖民地。中东地区的阿联酋便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得以合并,从而减轻了英国在当地的军事防务负担,并保证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持续存在。在英属马来亚地区<sup>①</sup>,英国也曾提出或支持北婆罗洲联邦计划和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最大程度维持了其在当地的实质利益。

再次,在推动殖民地独立过程中,英国政府大力推动西式民主的传播,促进意识形态的趋同化,扩大并巩固英联邦联盟。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大部分独立的英属殖民地选择跟随西方施行民主政体,或效仿英国建立议会民主体制,或建立总统共和制。政治制度上的趋同保证了原殖民地与英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性,从而维护英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大多数殖民地表面上在主动推进宪政制度改革,但在关键的宪政制度设立和国家形态选择方面效仿了英国,明显受到英国政府的影响。

取得民族或国家独立是非殖民化进程的最终结果,但其中过程却因国而异。某些中型或大型殖民地尽管民族主义运动成果斐然,但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仍然需要接受英国的指导或安排,或选择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或其他殖民地合并,一定程度上缺少了自主性。相比之下,以文莱为典型代表的一小部分小型殖民地,却能够突破自身体量狭小带来的实力限制,在国家独立等重要议题中做出自由选择,为自身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体现出“例外论”和矛盾性。

## (二) “文莱方式”的独特路径

所谓“文莱方式”是指,小型英属殖民地<sup>②</sup>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没有因为自身体量小导致的实力羸弱等客观事实,全程被动接受英国殖民政府的安排推进其独立进程,而是借助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体量小的“劣势”,提高了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议价能力,最大程度保障了自身在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的选择权,实

<sup>①</sup> 英属马来亚地区包含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五个马来属邦、北婆罗洲等范围。

<sup>②</sup> 这些小型殖民地包括文莱、巴林、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等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狭小国土面积的原英属殖民地。

现了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其中,自身体量和石油资源是“文莱方式”产生的核心要素,而殖民地与殖民母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互动则是推动“文莱方式”形成的主要过程。

文莱之所以成为这一类型殖民地非殖民化路径的典型代表,与其自身体量和不遵循英国非殖民化的常规安排存在反差有着较大的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国家体量的大小与国家自身实力的强弱存在正相关关系。体量越“大”,一国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更能消化国家内部产生的危机,抵御外部国家对其的侵扰,可以承受、防范、抵御和缓解各种内外风险,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反之,体量越“小”,一国则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内部或外部的风险与冲击,“抗打击能力”相对更弱。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保障方面,小国都会面对来自外部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压力,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和安全挑战。<sup>①</sup>在此逻辑下,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数量稀少的文莱等殖民地自身并不具备抵抗英国殖民势力的能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倾向于被动地接受英国的安排。然而,文莱在宪政制度改革和国家形态选择等重要议题上却没有遵循英国的意见,而是做出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这一行为与文莱自身狭小的体量形成强烈对比。尤其在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这一事件中,与巴林、卡塔尔等原英属殖民地不同,<sup>②</sup>在英国殖民势力尚未撤出的前提下,文莱违背了英国的意愿拒绝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历史选择不仅体现了“文莱方式”的核心内容,更凸显了以“小”搏“大”的反差性。

在既有研究中,学界对于英属殖民地的“文莱方式”关注较少,并没有对这一特殊的非殖民化路径进行分析,单个案例的剖析更为稀缺。一方面,对于包含文莱在内的东南亚非殖民化进程研究,研究者多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简单地叙述,未做深入分析,因此没有关注到文莱本身的独特性。大部分重要专著如《东南亚史》《东南亚历史发展》《大英帝国的瓦解》《剑桥东南亚史》《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和《帝国斜阳》等,对英国战后重返到撤离东南亚的分析都较为有限,仅以时间线为轴陈述了整体过程,论述角度也多从英国方面着手,个中

---

①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66页。

② 巴林、卡塔尔等地均在独立后才参与阿联酋的合并谈判,因此,在这方面文莱的案例更凸显了这一类型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的特殊性。

细节并未得到清晰的呈现。<sup>①</sup>

另一方面,针对文莱的非殖民化研究个案,学界也较少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剖析,基本没有文献提及文莱与东南亚其他英属殖民地,乃至全球范围内英属殖民地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差异,较少关注到“文莱方式”的特殊性。随着英国殖民时期档案材料的解密,更多关于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非殖民化政策及政府内部的实际想法被学界挖掘。不过,涉及文莱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尽管大量的史实呈现了文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独立的历史图景,但大部分研究仍以历史叙述为主,没有分析“文莱方式”产生的具体原因。<sup>②</sup> 针对文莱为何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历史问题,仅有的少部分文献认为,因为文莱与马来亚联合邦无法在政治体制设计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导致谈判失败。<sup>③</sup> 这一解释虽然从双方谈判的角度入手,指出文莱与马来亚联合邦在政治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存在矛盾,但说服力依然不足。尤其在体量同样之小的情况下,为何新加坡需听从英国安排,文莱却可遵从自己的意愿? 由此可见,这一观点仅仅指出文莱与马来亚联合邦在协议上存在的表面分歧,并未指出导致文莱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本原因,解释力依然欠缺。

文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是“文莱方式”的集中体现。这一历史事件主要涉及三大行为主体,包括文莱苏丹奥马尔(Muda Haji Omar Ali Saifuddien

① Daniel G. E. Hall,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981;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St. Martin's Griffin, 1997; [美]约翰·F. 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姚楠、马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英〕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顺洪:《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梁志明:《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D. E. Brown, “Brunei on the Morrow of Independence,” *Asian Survey*, Vol.24, No.2, 1984, pp. 201-208; B. A. Hamzah, “Oil and Independence in Brunei: A Perspectiv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1, pp. 93-99; A. J. Crosbie, “Brunei: The Constraints On A Small Stat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78, pp. 67-79; Roger Kershaw, “Challenges Of Historiography: Interpreting The Decolonisation of Brunei,” *Asian Affairs*, Vol.31, No.3, 2000, pp. 314-323; Saunders College, Graham E. Saunders, *A History of Brune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ohd. Salleh Abas, *Prinsip Perlembagaan dan Pemerintahan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7, p. 30.

③ 汪诗明:《论文莱的民族独立进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9—95页;D. S. Ranjit Singh,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Advancing the Theses of Decolonization and Competing Expansionist Nationalisms,”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Vol.7, No.2, 2015, pp. 209-217; Graham E. Saunders, *A History of Brune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tthew Jones, “Creating Malaysia: Singapore Security, the Borneo Territories, and The Contours of British Policy, 1961-63,”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28, No.2, 2000, p. 103; Aszlan Selamat, “Sabah Dalam Proses Pembentukan Persekutuan Malaysia,” *Jurnal Kinabalu*, Vol.19, 2013, p. 179.

III)、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以及两大根本因素,即文莱自身体量与石油资源。因此,探讨文莱与英国、马来亚联合邦的互动,以及分析文莱自身体量与石油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将成为了解非殖民化进程中“文莱方式”的重要路径。

## 二、英国对文莱认知的转变和非殖民化政策的形成

作为文莱的殖民母国,英国掌握了在文莱的殖民统治和非殖民化进程的话语权。在没有英国的准许下,文莱单方面较难依照自身意愿达成预想的发展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国土、人口规模狭小,地理位置不及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具有战略性,文莱遭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忽视,处于英国殖民版图的边缘地带。<sup>①</sup>然而,文莱发现和开采出石油的事实逐渐改变了英国对文莱的态度,文莱的重要性陡然提升。

1888—1963年间,英国对文莱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化,并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和矛盾的割裂状态——既在整体战略上忽视文莱,又不得不因为石油资源而重视文莱。在每个阶段中,自身体量和石油因素等要素均影响了英国对待文莱的态度,并相应地改变了其在文莱的殖民或非殖民化政策。

**1. 文莱作为边缘化小型殖民地(1888—1905年)。**长期以来,体量狭小、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不突出的文莱未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入侵文莱。1888年,双方正式签订《英国—文莱协议》,文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06年之前,由于林梦(Limbang)地区与沙捞越等地的领土主权纠纷,英国政府曾将文莱视作“麻烦的国家”,不希望过多地卷入相关事务。<sup>②</sup>于是,英国在当时并未在文莱派驻任何殖民官员,而是委任文莱苏丹进行间接统治。同时,根据英国殖民政府的文件显示,在多份涉及东南亚的防务文件中,英国政府均没有提及“文莱”,这从

---

<sup>①</sup>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London: IB Tauris, 2007, p. 32.

<sup>②</sup> A. V. M. Hort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Brunei 1906-1959,”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1986, p. 355.

侧面说明了文莱从未进入英国东南亚殖民政策的核心。<sup>①</sup>

2. 文莱的经济价值上升(1905—1941年)。由于石油在文莱的发现和开采,以及石油在英国战略地位的上升,英国政府明显转变了对文莱的态度,开始重视其存在。20世纪初,由于内燃机的迅猛发展,石油迅速成为重要的工业燃料,引发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1911年9月,丘吉尔就任英国海军第一大臣,着手解决英国海军动力系统的转轨问题,引发了能源燃料的变革。为此,丘吉尔成立了由上将费希尔(Admiral Fisher)和石油专家雷德伍德(Sir Thomas Boverton Redwood)领导的“燃料和发动机皇家委员会”,计划将海军舰队由煤炭驱动改为石油动力驱动,推动海军的现代化进程。<sup>②</sup> 由于本土并不生产石油,英国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石油资源,注重殖民地石油资源的开发。1903年,英国在诗里亚(Seria)地区的文莱河河口首次发现石油,表明石油在文莱的开采潜力,文莱的重要性开始上升。英国殖民部函告英国外交部说:“要对文莱苏丹施加一切影响,防止石油的开采租让权落入私人之手。”<sup>③</sup>之后,英国政府迅速调整文莱的殖民政策,于1906年签订补充协定,开始在文莱设立驻扎官制度,全面接管文莱的内政、外交和国防事务。1911年,盎格鲁-撒克逊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等石油勘探企业相继获得文莱油田的石油勘探权。1913年,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白拉奕(Belait)地区的拉比(Rabi)开采出可供实际使用的石油,之后于1929年在诗里亚地区发现大型油田。从此,石油成为文莱和英国殖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1933年,英国殖民政府从石油生产中征收的税款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5%,1935年增加到47%。<sup>④</sup> 文莱迅速成为英联邦内第三大石油生产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空军提供了足够的能源支持。<sup>⑤</sup> 在石油的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提升下,英国政府转变了对待文莱的态度,从之前的毫不重视到直接派驻殖民官员,牢牢地稳固了

①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p. 32-34.

② Brian S. McBeth, *British Oil Policy 1919-1939*,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

③ Jatswan S. Sidh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runei Darussal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 18.

④ 刘新生、潘正秀:《列国志:文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⑤ CO 71 7/110 (51535/1935) minute by (Sir) G. E. J. Gent (1895-1948), March 19, 1935, quoted from A. V. M. Hort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Brunei 1906-1959,”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1986, p. 366.

对文莱的殖民统治。

3. 文莱的战略地位凸显(1945—1963年)。虽然石油的存在改变了英国对待文莱的态度,使得文莱的战略地位得以提升,但因为自身体量的先天性狭小,文莱在英国的东南亚殖民版图中的地位仍未得到实质提高。英国方面既因石油资源重视文莱,又因狭小体量忽视文莱的矛盾态度,催生出了特殊的非殖民化政策。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石油在未来军事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莱的石油产量稳固增加,到1956年时,产量已达564万吨/年,最高峰曾达1.7万加仑/天,之后稳定在1.5万加仑/天。<sup>①</sup>丰富的石油产量在为文莱自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的同时,也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储备。为持续性地从文莱获得石油资源,英国政府没有破坏与文莱苏丹奥马尔之间的关系,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势,与苏丹政府保持友好往来。作为在东南亚非殖民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在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等多地推行民主制度改革,并鼓励马来地区的英属殖民地进行合并。不过,文莱却成为这些殖民地中的例外。

第一,在宪政制度选择方面,文莱没有实行英国式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复并巩固了伊斯兰君主制。通过1959年宪法的制定和1962年对文莱人民党的镇压,文莱苏丹奥马尔成功恢复伊斯兰君主专制体制,成为文莱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与在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沙捞越等地鼓励组建政党和举行议会选举等不同,英国方面并未过多干涉苏丹增强自身王权的行为,也没有阻止文莱向君主专制政体发展的趋势,后期甚至出兵镇压文莱人民党代表的进步现代力量,帮助苏丹巩固其自身的地位和权力。英国政府深知一个由文莱人民党掌握的政府将不会再保护英国在当地的石油利益。<sup>②</sup>因此,哪怕文莱苏丹奥马尔决定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英国方面也未过多干涉。

第二,在国家独立形态方面,英国默许了文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决定,没有进行强力干涉。由于在马来亚联邦、北婆罗洲地区的殖民地较多且

---

<sup>①</sup> Jatswan S. Sidh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runei Darussal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 238.

<sup>②</sup> B. A. Hamzah, "Oil and Independence in Brunei: A Perspectiv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1, p. 94.

分散,所以,英国政府战后多鼓励这些殖民地进行合并。1949年,东南亚地区英国高级专员麦克唐纳提出要将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合并,形成统一的北婆罗洲联邦,这一主张也得到麦克唐纳继任者罗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Robert Scott)的推崇。<sup>①</sup>为此,麦克唐纳与沙捞越州总督、文莱高级专员阿贝尔(Anthony Abell)共同负责执行该计划,在三地之间每六个月组织一次总督会议,希望三地可以联合起来,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sup>②</sup>不过,在文莱苏丹奥马尔公开表示反对后,英国政府只能转而支持马来亚联合邦提出的马来西亚联邦计划。英国认为,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合并后,将降低共产主义对该地区的渗透风险,因此,该提议在原则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sup>③</sup>之后,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游说、拉拢亲英分子、恐吓威胁等方式,推动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等地参与马来西亚联邦的谈判。<sup>④</sup>但是,英国政府始终没有强迫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只是认为加入联邦将提高文莱的防务能力,保障其自身安全。<sup>⑤</sup>在文莱表态拒绝后,英国方面未有进一步的行动。<sup>⑥</sup>

在文莱是否实行民主政体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问题上,英国对待文莱的态度和随之形成的非殖民化政策主要受到文莱体量和石油资源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过于狭小的体量决定了文莱不会占用英国政府过多的军事资源,同时也无法对英国或马来地区造成实质性安全威胁,任何影响英国利益的行为均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哪怕文莱没有施行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也不会对英国在当地的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可见,狭小的体量成为文莱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挡箭牌”。另一方面,文莱的石油资源成

<sup>①</sup>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p. 32-33.

<sup>②</sup> Ibid., p. 32.

<sup>③</sup>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from D. C. White to C. G. Eastwood on 6th February 1962," ref: HCO/S/504/62(1) in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 117.

<sup>④</sup> [苏联]H. A. 西莫尼亚:《是“大马来西亚”还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4期,第54页。

<sup>⑤</sup>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Summary Note of Discussion with the Sultan of Brunei at the Istana, Brunei on 15th January 1962,"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 131.

<sup>⑥</sup> 65 Cablegram from Barwick to London-Historical Documents-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25/Pages/065-cablegram-from-barwick-to-london>, 2020-09-01.

为诱使英国采取放任态度的原因。苏丹的专制统治和文莱维持“保护国”的身份都方便了英国维持与文莱的关系,帮助英国可以不断从文莱的石油资源中攫取利益。因此,哪怕苏丹的举动不符合英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英国政府依然为了石油利益,选择保护苏丹为代表的传统精英阶层。从根本上说,英国政府本身并不在意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其核心关切是英国在文莱的石油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文莱自身体量的狭小决定了英国对待文莱的基本态度——文莱从未进入英国殖民政府东南亚政策中心,其边缘地带的位置并未随着石油的发现产生根本性改变。不过,石油的发现和随之带来的巨大利益却不得不让英国政府与文莱保持友好关系。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张力下,英国才默许了文莱的“叛逆行为”,为苏丹奥马尔最大化自身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三、马来西亚联邦对文莱的友好态度 与自身统合力度的下降

作为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的提出者与推动者,马来西亚联邦组织并主导了整个谈判过程,是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外在拉力之一。纵观整个谈判过程,由于文莱社会的相似性和石油资源的巨大利益,马来西亚联邦始终力邀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不过,在马来西亚联邦友好态度的“纵容”下,石油的存在和自身体量狭小带来的“优势”降低了文莱加入联邦的迫切程度,马来西亚联邦对文莱的统合力度遭到相应的弱化。

自马来西亚联邦计划酝酿和正式提出起,马来西亚联邦便大力邀请文莱加入联邦。对马来西亚联邦来说,文莱是个非常理想的联邦伙伴。第一,文莱与马来西亚联邦都信奉伊斯兰教,拥有共同的马来文化传统,都说马来语,在文化上拥有极大的相似性;第二,文莱和马来西亚联邦都以马来族为主要民族,双方的人口构成较为相似。在以华人为多数人口的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联邦中马来族的人口比例将会下降,邀请文莱加入将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这一态势,从而保证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联邦中的绝对地位;<sup>①</sup>第三,文莱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巨额的财政收入,它的加入可为马来西亚联邦充盈国库。鉴于此,马来亚联合邦释放出积极的拉拢信号,并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主动拉近与文莱的关系,向其提供行政和军事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推进北婆罗洲联邦,试图将文莱和沙捞越等地进行合并。不过,文莱苏丹和上层阶级群体对此非常抵触。为了阻止该计划,苏丹奥马尔一方面拒绝了英国政府派驻的沙捞越官员,另一方面积极向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求助,请求借调部分行政官员以协助文莱开展日常行政工作。<sup>②</sup> 马来亚联合邦东姑·拉赫曼总理答应了苏丹奥马尔的请求,并于1960年派遣了包括自己的私人秘书旺·艾哈迈德(Wan Ahmad)在内的数百名官员和教师前往文莱,协助文莱政府恢复和重建行政、教育等基础机构。<sup>③</sup> 此外,文莱缺乏必要的防卫力量,缺少军事组织、训练和作战经验。在取得自治权后,苏丹奥马尔曾表达希望可以建立自己的防卫力量的想法,力求在英国可能撤出东南亚的情况下,保障自身的安全。<sup>④</sup> 1960年,在访问马来亚联合邦时,苏丹提出希望马来亚联合邦帮助训练文莱士兵的设想,马来亚联合邦东姑·拉赫曼总理随即应允。在1961年文莱马来皇家军队正式成立后,约有59名士兵被送往马来亚联合邦受训,并完成了第一次训练。<sup>⑤</sup> 到1961年底,共有325名士兵入伍受训。<sup>⑥</sup>

第二,为了吸引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马来亚联合邦在谈判过程中不惜再三修改协定条款,做出让步。对于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文莱和马来亚联合邦

① Matthew Jones, "Creating Malaysia: Singapore Security, the Borneo Territories, and the Contours Of British Policy, 1961-63,"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8, No.2, 2000, p. 88; 1 Submission No.1304 from Menzies to Cabinet-Historical Documents-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25/Pages/001-submission-no-1304-from-menzies-to-cabinet>, 2020-09-01.

②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from C. G. Eastwood to W. I. J. Wallace on 27th February 1962," File No.Fed/59/4/014 in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p. 94-95.

③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to Mr. Melville on 22nd May 1959," File No.Fed. 36/775/03 in *CO 1030/529 Exchange of Letters and Initialed Agreements*, pp. 228-229.

④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41.

⑤ Ibid., p. 42.

⑥ Ibid.

主要在政治体制和经济收益两方面存在分歧。苏丹奥马尔始终认为,文莱境内发现的石油收入应该由文莱地方政府独享,但马来亚联合邦则认为文莱地方应在加入联邦五年后向联邦政府缴纳石油的税收,对此双方争执不断。<sup>①</sup>为了争取苏丹奥马尔的支持,在不惜可能损及与沙捞越、北婆罗洲关系的情况下,马来亚联合邦在谈判后期不断做出适当的调整,将缴纳石油税收的时间从五年放宽至十年。<sup>②</sup>

然而,马来亚联合邦的让步并没有提高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迫切程度。相反,马来亚联合邦营造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给予苏丹较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凭借石油资源的优势和体量狭小带来的“弱国”认知,文莱被马来亚联合邦统合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首先,文莱地理上的劣势,以及综合国力上与马来亚联合邦的差距降低了自身对于马来亚联合邦的威胁,塑造了“弱国”的国家形象。地理位置上,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被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包围,不占据任何的战略优势。国家体量上,文莱的国土面积为5765平方公里,与马来亚联合邦(面积13.1313万平方公里)以及形成后的马来西亚联邦(面积33.107万平方公里)相比,领土规模相差20倍以上。<sup>③</sup>人口规模上,文莱在1963年参加谈判时人口约9.354万人,而当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有897.3788万人,<sup>④</sup>人口数据也相差近百倍。稀少的人数造成文莱军事力量的极度弱小,在本土基本没有军事力量的前提下,防卫任务完全依靠英国殖民政府。物质性条件上的差距直接塑造了文莱的“弱国”形象,形成了马来亚联合邦对文莱的“弱国”认知。这种认知为其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达成自身的政策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战略契机。<sup>⑤</sup>

其次,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文莱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为文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的保障。得益于稳定的石油产出,文莱社会和王室的财富不断累

---

①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from D. C. White to W. I. J. Wallace on 27th November 1961," File No.HCO/S/504/61(3) in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 189.

② Anthony J. Stockwell, "Britain and Brunei, 1945-1963: Imperial Retreat and Royal Ascendanc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38, No.4, 2004, p. 812.

③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文莱达鲁萨兰国>;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马来西亚>, 2020-07-08。

④ 同上。

⑤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230页。

积。文莱的年收入从 1908 年的 4.3539 万美元迅速增加至 1953 年的 9800 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sup>①</sup>在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下,石油方面的收入已经可以保证文莱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sup>②</sup>此外,文莱还拥有着丰富的林业和渔业资源,其水资源也能够基本保证国内的供应,战略资源较为充足。与之相比,缺乏必要淡水战略资源的新加坡就过分依赖马来西亚联邦,导致其安全脆弱性的提高。

再次,前文已经提到,因为石油和体量的双重作用,英国对文莱实施了较为特殊的非殖民化政策,给予苏丹奥马尔较大的自主空间来决定文莱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英国的庇护下,文莱的“保护国”身份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在英政府的协调下,哪怕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文莱自身安全也不会受到威胁。

在谈判过程中,马来亚联合邦积极拉拢文莱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友好态度和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莱创造友好的地区氛围,但反之却也为苏丹奥马尔提供了宽松的决策空间,进而加大了马来亚联合邦统合文莱的难度。

#### 四、苏丹王权的增强与自治意愿的提高

文莱苏丹奥马尔在非殖民化进程中不断扩大权力,促使自己成为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唯一决策人。面对较为和平的外部环境,苏丹奥马尔始终以自身利益能否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依据,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深入,其加入马来西亚的迫切程度逐渐降低。

##### (一) 苏丹奥马尔内控力的提高

通过 1959 年宪法的出台和 1962 年内部起义的镇压,苏丹奥马尔正式确立并巩固了伊斯兰君主专制统治,肃清了文莱社会内部的左翼改革力量,赋予了

---

<sup>①</sup> A. V. M. Hort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Brunei 1906-1959,"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1986, p. 370.

<sup>②</sup> David Phillips, "The 'Migrated Archives' and A Forgotten Corner of Empire: The British Borneo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44, No.6, 2016, p. 1007.

自身代表文莱处理内政的实际唯一决策权。

1. 文莱苏丹王权的重建(1888—1945年)。文莱有着悠久的伊斯兰君主制历史。在君主制的背景下,文莱苏丹占据了社会阶级的顶端,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大权于一身。不过,随着布鲁克王朝的入侵,文莱的领土主权遭到侵蚀,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转变,苏丹受到国内地主阶级的不断冲击。在1888年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之前,文莱社会内部已经没有了“政府”的概念,只强调土地所有权。整个国家的土地被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王室土地、部长土地和私人土地。<sup>①</sup> 地主享有其所属土地上的一切权利,包括行政、税收等,拥有土地上的所有资产,包括人力资源(主要是农奴)、物资等。<sup>②</sup> 苏丹除了管理王室土地和土地上的农奴外,无权干涉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其权力完全被限制在王室土地的范围之内。此外,苏丹的王位继承权也被国内地主阶级干涉。许多地主认为自己有权决定王位的继承人选,对不满意的人选常常选择不服从命令,造成文莱社会内部频繁出现地方派系斗争,妨碍了国内行政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政治极度不稳定。<sup>③</sup> 在英国殖民势力介入文莱之前,苏丹已经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权力和地位受到挑战。

苏丹的权力在文莱被英国殖民后开始重建。1888—1906年,英国殖民当局结束了文莱社会内部长期混乱的行政体制,确立了以苏丹为首的当地政府,苏丹的权力开始恢复。1906年,英国政府在文莱实行新的殖民行政管理体制,替代了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尽管文莱的外交、军事、苏丹王位继承权等均由英国殖民政府控制,但苏丹被保留了宗教和文化上的领袖身份。这一模式既保护了以苏丹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上层的特权,又沿袭了原来的社会制度,从而维护了传统社会的基础和结构,根本利益上维护了苏丹的权力和文莱民族传统。<sup>④</sup> 虽然苏丹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在英国殖民管理制度下,苏丹已成为除驻扎官外权力最大的文莱代表。此外,国务议会成员除驻扎官外,也都由苏丹

---

① Donald E. Brown, *Brunei: The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A Bornean Malay Sultanate*, Brunei Museum, 1970, pp. 79-85.

② A. V. M. Hort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Brunei 1906-1959,"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1986, p. 360.

③ Ibid., p. 361.

④ Mark Cleary, Shuang Yann Wong, *O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in Brunei Darussalam*,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130.

任命,人员多为王室或苏丹的亲信。<sup>①</sup>在这样的行政制度安排下,文莱社会内部权力已基本集中到苏丹一人手中。

2. 文莱苏丹王权的强化与巩固(1945—1962年)。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尽可能地满足了文莱苏丹的要求,默许了苏丹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宪法的要求,并多次派兵镇压文莱社会内部反抗苏丹的左翼民族主义力量。苏丹王权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通过现代制宪的外衣实现了王权的现代化转变,增加了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1) 伊斯兰君主制的确立(1959年宪法的颁布)。通过颁布1959年文莱宪法,苏丹在法律上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与拥有的权力,现代伊斯兰君主制在文莱正式确立。<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莱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日渐威胁到苏丹及王室的特权地位。20世纪50年代,文莱电影制片公司曾策划了一次试图推翻苏丹政权的游行。和以往反抗日本侵略和英国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此次运动的目标对准了苏丹。<sup>③</sup>在英国政府的镇压下,此次运动很快便被平息,苏丹的地位也得到了保证。不过,这次游行之后,苏丹开始借此机会了解民间对王室的想法,试图通过制宪树立统一的民族主义形象,保证自身的权力和地位。

苏丹奥马尔1953年首次向英国政府表达制宪的想法,之后逐步推进制宪过程。苏丹先后任命了七名文莱官员,组成咨询委员会调查民意。1956年,在收集民意的基础上,文莱国务议会通过了《地方政府条例》,加强了苏丹对地方政权的管控,为日后制宪奠定了基础。<sup>④</sup>由于害怕过度压制引起文莱境内民族主义的反抗,让共产主义势力有机可乘,因此,在1959年苏丹奥马尔提出制定宪法时,英国驻文莱高级专员阿贝尔给予充分支持。他希望,文莱可以通过宪法限制苏丹的君主权力,并保留英国在当地的权力。<sup>⑤</sup>同时,文莱也可以

① A. V. M. Horto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Brunei 1906-1959,"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1986, p. 362.

② Anthony J. Stockwell,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eo-Colon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26, No.2, 1998, p. 143.

③ Graham Saunders, *A History of Brune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6-137.

④ 汪诗明:《论文莱的独立进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0页。

⑤ B. A. Hussainmiya,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I and Britain: The Making of Brunei Darussala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8.

创建新的立法议会,取代老旧过时的国务议会。<sup>①</sup>然而,苏丹奥马尔却没有如英国政府预想的限制自身权力,反而通过宪法扩大了王权。

根据1959年文莱宪法,文莱君主制政体得以延续,苏丹享有国家立法权与行政权。苏丹下设枢密院,负责向苏丹提供关于宪法修订、政府官员任免和王室等事宜的咨询。<sup>②</sup>从根本上说,1959年宪法只体现了苏丹本人的权力和意志,保护了文莱传统特权阶层的权益,完全忽略了人民在文莱国内的合法权利,与英国倡导的建立民主政体、限制苏丹权力等意愿背道而驰。通过该宪法,苏丹在文莱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sup>③</sup>虽然最后出台的宪法并没有按照英国的想法迈向民主化,但英国政府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2) 文莱伊斯兰君主制的巩固(1962年起义的镇压)**。由于本地民族主义力量孱弱,文莱社会的左翼民族主义力量很快在英殖民政府的帮助下被镇压,苏丹奥马尔得以进一步加强王权。

1956年,文莱人民党在阿扎哈里(A. M. Azahari)的领导下建立,倡导文莱实现自治与民主。<sup>④</sup>但是,1959年宪法的出台却与人民党一直以来实现民主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文莱人民党坚决反对实施该宪法,希望文莱可以进行快速的民主化,限制君主权力。1962年,文莱人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大胜。获胜后的文莱人民党提出三大主张,包括拒绝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建立北婆罗洲联邦,以及英国最迟于1963年承认北婆罗洲的独立身份等。<sup>⑤</sup>但是,这些提议均遭到苏丹奥马尔和英国政府的否决。之后,苏丹奥马尔决定推迟第一次新立法议会的召开,并派文莱官员前往吉隆坡参与马来西亚联邦的最后一轮圆桌会议。这一行为激起了文莱人民党的反抗,并最终于1962年12月8日爆

---

① B. A. Hussainmiya, *The Brunei Constitution of 1959: An Inside Story*, Bandar Seri Begawan: Brunei Press Sendirian Berhad, 2000, p. 14.

②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Brunei (1959), [http://www.agc.gov.bn/AGC%20Images/LAWS/Gazette\\_PDF/1959/EN/S099.pdf](http://www.agc.gov.bn/AGC%20Images/LAWS/Gazette_PDF/1959/EN/S099.pdf), 2020-12-18.

③ 汪诗明:《论文莱的独立进程》,第91页。

④ 从性质上看,文莱人民党是典型的左翼民族主义政党。该党不仅要求文莱实现自治,更希望可以限制苏丹权力,让文莱实现民主选举,直选立法议会。

⑤ CO 1030/825/42/22. Note to the Secretary, British Defenc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ar East) from the Secretary,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The Note is dated 19 January 1962 and is entitled Preparation of Defence Scheme for Brunei, quoted from Majid H A.,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79.

发武装起义。<sup>①</sup>

在此次起义中,约有 80% 的文莱成年男性参与其中,人数大约在 2000—6000 人左右。<sup>②</sup> 尽管参与人数可观,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少,左翼民族主义力量实质上依然弱小,最终未能形成推翻苏丹王权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绝对力量。同时,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和行动策略,缺少斗争武器和物质基础,12 月 8 日,在起义爆发当天攻击警察局时,就有一部分参与起义人员被警察逮捕,起义人群很快投降。<sup>③</sup> 随后,英国政府迅速从新加坡出兵,在一周的时间内便镇压了起义。随着阿扎哈里逃亡印度尼西亚,文莱人民党随之解散。<sup>④</sup> 12 月 20 日,苏丹奥马尔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中止宪法并取缔所有政党,自此苏丹成为文莱政治舞台中的唯一角色。<sup>⑤</sup>

出人意料的是,凭借处理起义时的克制行为和得体举止,苏丹奥马尔进一步笼络了文莱人民的人心,提高了在国内的声望。<sup>⑥</sup> 虽然 1962 年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苏丹政权,但英国方面的镇压却从侧面帮助苏丹奥马尔清除了内部左翼势力,使其从危机中脱身。此次起义的发生让苏丹奥马尔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实施君主专制政体,阻止自由主义扩散和民主化政策的施行。此后,苏丹奥马尔正式握有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唯一决策权。

## (二) 苏丹奥马尔自治意愿的加强

通过 1959 年宪法制定和 1962 年肃清左翼分子等事件,苏丹君主专制政权在文莱基本确立。作为独裁君主,领导人倾向于尽力保住自身权力。<sup>⑦</sup>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苏丹不仅将重视文莱整体的利益,更会衡量在加入马来西亚联

① Amy Azuan Abdullah and Aping Sajok, "Pemberontakan Weston 1962," *Jurnal Borneo Arkhailogia (Heritag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Vol.1, No.1, 2017, p. 46.

②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98.

③ Ibid., p. 89.

④ 10 Cablegram to Canberra-Historical Documents-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25/Pages/010-cablegram-to-canberra>, 2020-09-01.

⑤ Amy Azuan Abdullah and Aping Sajok, "Pemberontakan Weston 1962," pp. 52-53.

⑥ Ibid., p. 101.

⑦ [美]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陈子恪、刘骥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 页。

邦后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在谈判的最后阶段,苏丹奥马尔最终因自身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证,拒绝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假设苏丹奥马尔是理性行为体,参与马来西亚联邦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出发点,苏丹在谈判过程中则需要考虑两方面的条件,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其一,政治生存,即自身政治权力得以完整保留,自身王权和社会地位可以稳固并延续;其二,经济利益,即保证自身和文莱社会依然可以享受绝大部分石油收益。因此,只有在选择结果可以满足,或者说尽可能满足全部需求时,苏丹奥马尔才会决定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在最后做出决定前,苏丹奥马尔对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曾经历两次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契合了他对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出发点和唯一目标,即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在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提出初期,苏丹奥马尔对该计划表示赞同,展现出了浓厚兴趣。<sup>①</sup> 不过,苏丹这样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避英国和文莱社会内部执意推动北婆罗洲联邦计划的行为。<sup>②</sup> 苏丹奥马尔认为,与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合并后,文莱的安全和生存空间将面临较大的威胁。一方面,由于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中的华人数量较多,合并后将大量的移民涌入文莱,威胁文莱本地居民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文莱自身行政能力不足,无法管理整个国家,合并后文莱的行政或将由沙捞越负责,<sup>③</sup>文莱的地位可能从“保护国”降为“殖民地”。<sup>④</sup> 此外,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的经济发展滞后,合并后文莱将不得不与沙捞越、北婆罗洲分享石油收益,用来补贴两地的发展。<sup>⑤</sup> 苏丹本人的权力或也将因为实行新的政治制度,从绝对君主降为立宪君主。<sup>⑥</sup> 加入北婆罗洲联邦将

---

①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from Mr. W. I. J. Wallace to Mr. Eastwood and Sir John Martin on 12th December 1961,"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p. 16-18.

② Ibid.

③ Muhammad Hadi Abdullah, *Brune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1961-196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2002, p. 18.

④ D. S. Ranjit Singh, *Brunei 1839-1983: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Survival*,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3-144.

⑤ Muhammad Hadi Abdullah, *Brune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1961-196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2002, p. 143.

⑥ Haji Zaini Haji Ahmad, "Pertumbuhan Nasionalisme di Brunei 1939-1962," *Selected Documents/Dokumen Terpilih*, Kuala Lumpur: 2R Publication, 1987, p. 60.

意味着苏丹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将大大受损,显然不利于苏丹个人的利益。因此,苏丹奥马尔在之后的会谈中坚决拒绝了该项提议。<sup>①</sup> 1958年,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的出现对苏丹奥马尔来说好比是“救命稻草”,可以转移英国和国内民众对于北婆罗洲联邦计划的巨大关注。于是,苏丹奥马尔积极拉近了与马来西亚联合邦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这些行为也让英国殖民官员相信,苏丹奥马尔对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态度非常的坚定。“他渴望担任最高元首的职务,希望成为马来苏丹俱乐部的成员。作为一名马来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看到马来语成为亚洲地区内重要的语言。他还十分重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sup>③</sup>

然而,随着谈判的深入,文莱社会内部出现了明显反对苏丹奥马尔参与谈判的舆论倾向。1961年文莱民众袭击马来西亚联合邦官员,以及1962年起义的发生,让苏丹奥马尔意识到文莱民众对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抗拒心理,也开始让其态度出现摇摆。<sup>④</sup> 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根据国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文莱民众对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都表达了“强硬反对”(stiff opposition)。<sup>⑤</sup> 1961年,在新加坡举办英联邦议会协会(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CPA)第八届区域会议期间,英国与众多成员国商讨了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的实施前景,但文莱并没有派出任何代表或者观察员参加。<sup>⑥</sup> 这从侧面表现出在民意的影响下,苏丹奥马尔对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已经开始犹豫。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计划谈判议程进入最后阶段,参与方以讨论联邦协议条款为主要谈判内容。彼时,苏丹奥马尔已成为文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

① B. A. Hussainmiya, *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I and Britain: The Making of Brunei Darussala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1.

② CO 1030/937. Report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ated July 12, 1960 on Brunei/Malaya Relationships, quoted from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55.

③ CO 1030/1448. White to the Colonial Office, August 29, 1961, quoted from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55; 1 Submission No.1304 from Menzies to Cabinet-Historical Documents-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25/Pages/001-submission-no-1304-from-menzies-to-cabinet>, 2020-09-01.

④ 刘新生、潘正秀:《列国志:文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⑤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Report on the Public Hearings of the Menteri Besar’s Committee on Malaysia on 27th February 1962,”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 89.

⑥ Aszlan Selamat, “Sabah Dalam Proses Pembentukan Persekutuan Malaysia,” *Jurnal Kinabalu*, Vol.19, 2013, p. 174.

邦的唯一决策者。在此情况下,苏丹在参与谈判时,一再强调马来亚联合邦必须答应他提出的所有要求,文莱才会加入马来西亚联邦。<sup>①</sup> 由于各方在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分配两方面始终存在分歧,苏丹奥马尔彻底对马来西亚联邦计划失去兴趣。

首先,联邦政治体制设计难以确保文莱苏丹的政治生存,削弱了其政治权力。马来西亚联邦协议规定,联邦将在成立后推行民主政体,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苏丹虽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是当地宗教的领袖,但其实际权力将被限制。这意味着在进入马来西亚联邦后,文莱苏丹将只享受名义上的最高元首职位。同时,协议中指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将实行轮流制,由各州苏丹依次担任五年,最高元首的位次则将依据各邦签约时间决定。当时,由于马来亚联合邦的各州苏丹均提前参与到谈判中,因此和文莱苏丹相比,马来亚联合邦各州苏丹均享有优先权成为最高元首。这表明文莱苏丹将成为最后一位加入联邦的王室,将需要等待50年才会成为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与在文莱享受实质性的最高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政治地位相比,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显然威胁到了苏丹的政治生存。

其次,联邦经济利益分配安排事实上大幅降低了文莱王室和社会的既有经济福利。马来亚联合邦方面坚持文莱在加入联邦十年后,文莱的石油控制权应该转交至联邦政府,但苏丹奥马尔却希望保留对石油收入的控制权。此外,马来亚联合邦方面还希望文莱每年向联邦政府提供4000万美元的强制性捐款,<sup>②</sup>但苏丹认为该笔捐款应该出于自愿,不能强迫支出。<sup>③</sup> 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意味着文莱王室和社会现有的石油收益将被迫与中央政府共享,最终被中央政府掌控,而文莱地方将不再享有石油的独有收益权。这一协议内容明显触犯了苏丹奥马尔的经济利益。东姑·拉赫曼总理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

---

① Muhammad Hadi Abdullah, *Brunei'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1961-196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2002, p. 137.

②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Letter from D. C. White to W. I. J. Wallace on 27th November 1961," File No.HCO/S/504/61(3) in CO 1030/1012 *Brunei aspects*, p. 189.

③ Sani Suryani Abu Bakar, "Dasar Britain Terhadap Brunei Selepas Penolakan Brunei Dari Menyertai Malaysia Pada Tahun 1963," p. 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5256421\\_Dasar\\_Britain\\_terhadap\\_Brunei\\_selepas\\_penolakan\\_Brunei\\_dari\\_menyertai\\_Malaysia\\_pada\\_tahun\\_1963](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5256421_Dasar_Britain_terhadap_Brunei_selepas_penolakan_Brunei_dari_menyertai_Malaysia_pada_tahun_1963), 2020-9-20.

苏丹执意要保护石油资源开采权,不愿意妥协。<sup>①</sup>这也表明了苏丹奥马尔对于维护文莱石油资源和收益的决心。

同时,出于对石油的重视,英国在防务安全上保证了文莱的生存。在1962年起义中,英国的快速反应使得苏丹在心理上对英国防务力量逐渐产生依赖。<sup>②</sup>英国的防务力量让苏丹奥马尔有理由相信,哪怕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文莱自身的安全也将得到保障。因此,1963年7月,苏丹奥马尔在马来西亚联邦谈判的最后一次讨论时,已经开始讨论未来文莱与英国的关系,提到要探索“加强文莱与英国的国防协议”的想法,希望英国政府可以“尊重现有的保卫文莱的协议”。<sup>③</sup>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下,马来西亚联合邦无法与文莱展开直接对抗,采取过激的报复措施,从而保障了文莱的生存空间。

综合考量之下,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自身的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将无法得到保证,而不加入却能在英国的庇护下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拒绝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成为苏丹奥马尔最理性的选择。

## 结 论

本文以1963年文莱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为典型案例,展现了“文莱方式”产生的具体过程和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文莱的自身体量和石油资源成为贯穿“文莱方式”产生的核心要素,在文莱与英国、马来西亚联合邦等多方互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文莱石油的存在和开采改变了英国对文莱的认知,增加了文莱对马来西亚联合邦的吸引力,减弱了马来西亚联合邦对于文莱的统合力度。第二,体量狭小的事实帮助文莱塑造了“弱国”形象,减少了英国对苏丹奥马尔选择的干预,同时降低了马来西亚联合邦对文

---

<sup>①</sup> 65 Cablegram from Barwick to London-Historical Documents-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volume-25/Pages/065-cablegram-from-barwick-to-london>, 2020-09-01.

<sup>②</sup> Harun Abdul Majid, *Rebellion in Brunei: The 1962 Revolt, Imperialism, Confrontation and Oil*, p. 171.

<sup>③</sup> Telegram from Mackintosh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July 1963, Cited in FCO371/169703, 11 July 1963, quoted from Abd Manan W., *Brunei's Preference for British Protecti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fter the 1962 Rebellion*, Ph. 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5, p. 17.

莱的警惕,为文莱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决策环境。第三,文莱苏丹奥马尔自身王权得以增强,成为文莱社会的实质掌权者。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苏丹奥马尔在政治生存和经济利益的权衡下,最终选择不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决定不仅保留了文莱的政治实体地位,为其1984年的独立奠定基础,更实现了文莱非殖民化路径的驱异化,体现了“文莱方式”的产生过程和具体内涵。

其实,文莱并不是英属殖民地非殖民化进程中“文莱方式”的孤例。类似的体量狭小、拥有石油资源的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等原英属殖民地,均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确立了伊斯兰君主制,并取得了小国的独立,看似“违背”了英国的意愿。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小型殖民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政策和自身优势,成功地以“小”搏“大”。然而,在既有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常规研究视角较多聚焦于英国、法国等殖民母国,将非殖民化解释为殖民政府的主动战略选择,忽略了殖民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动选择行为。“文莱方式”则凸显出小型殖民地自身体量“小”的辩证作用,也展示出凭借自身优势资源达成既定目标的独特的非殖民化路径。对于非殖民化研究来说,这是研究视角的良性补充与研究范式的再拓展。